

从经学启蒙到文学启蒙

现代文学思潮的中国生成

郝明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年重庆师范大学学术出版

从经学启蒙到文学启蒙

现代文学思潮的中国生成

郝明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经学启蒙到文学启蒙:现代文学思潮的中国生成/郝明工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161-2738-4

I. ①从… II. ①郝…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282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晓鸿

责任编辑 陈尚静

责任校对 王兰馨

责任印制 戴 宽

版 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75

插 页 2

字 数 231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中国启蒙与现代文学

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现有研究来看，通常是将文学运动的兴起视为文学思潮的肇起，致使现代文学思潮的中国生成没有能够引起研究者的应有关注。这种关注不够的主要原因，就是忽略了中国文学启蒙对于现代文学思潮生成的影响与制约。事实上，如果承认中国启蒙的文化性质，并且呈现出从经学启蒙到文学启蒙的形态演变，那么，也就应该看到中国文学启蒙的思想影响，促成了现代文学思潮的涌动，而现代文学思潮的涌动促成了现代文学运动的兴起；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文学启蒙的意识形态重建诉求，通过现代文学思潮的中介作用，制约了文学运动的全面兴起。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兴起，既需要理论倡导的率先进行，又难以避免理论倡导优先于文学创作的运动偏至。

这就表明，有必要从现代文学思潮的中国生成这一角度，来探讨中国文学启蒙与现代文学思潮之间复杂的共生关系，即文化思潮、社会思潮、政治思潮、文学思潮之间相辅相成的共时性关联。与此同时，这一共生关系的中国语境就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因而文学启蒙的中国存在与现代文学思潮的中国生成也就成为文化转型中的同一运动，即文化运动、社会运动、政治运动、

文学运动之间相反相成的历时性过程。这就能够为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和形成提供多向度的文本阐释空间，而不再拘泥于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直接对应中单向度的文本分析格局。

于是，这就需要重新认识文学启蒙与中国启蒙的关系、现代文学思潮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的关系，只有以对这三大关系的现有研究为起点，才有可能在研究视野的努力拓展中开始个人的重新认识。在这一重新认识中，由于考虑到中国文化转型不仅与外来文化的现代影响有关，更与本土文化的传统影响有关，尤其是本土文化的传统影响在现有研究的一定阶段中一度被忽视，甚至被排斥，因而在重新认识中也就必须意识到：无论是中国文学启蒙，还是现代文学思潮生成，中外文化的影响始终是并存的，尽管有着主次深浅之分。这将成为重新认识以上三大关系的现实前提。具体而言，对于三大关系的重新认识，就必须从以下三个问题方面入手：中国启蒙的形态演变、新文学的源流、现代文学的断代。

对于中国启蒙的初次认定，是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作出的，指出明末清初的“启蒙运动”就是“舍经学无理学”的经学启蒙，其所形成的学术思想足以启动清末民初的中国第二次文化启蒙运动，中国文化启蒙由经学启蒙演变为文学启蒙，也就是文学艺术与“其他学术相联络呼应，为趣味极丰富之民众的文化运动”。这就表明，中国启蒙从根本上看，就是思想启蒙。无论是经学启蒙的文本表达，还是文学启蒙的文本表达，都是通过文本表达来使思想启蒙得以彰显，并且表现出中国启蒙进行意识形态重建的现实指向。这样，通过从经学启蒙到文学启蒙的形态演变，促使意识形态重建从对官学体制的经学复古转向文化运动的文学创新。

梁启超以中国启蒙比照欧洲，不仅对比了欧洲的启蒙运动，而且更仿照了欧洲文艺复兴，认为经学启蒙促成的“清代思潮”，

“其动机和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首先是“以复古为解放”的经学启蒙，要从“复宋之古”开始，直至“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随后是“徐徐进化”的文学启蒙，要求在“今后西洋文学美术，行将尽量收入”的同时，更要“采纳之而傅益以己之遗产，创成新派”。^①这就表明，随着中国启蒙的文化资源从本土文化扩展到外来文化，直接促成了从经学启蒙到文学启蒙的形态演变，因而中国启蒙中本土文化的传统影响，始终是存在着，并且在外来文化的现代影响不断扩大的同时，本土文化的传统影响依然不可忽视。不久，梁启超又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又将清学各部分稍微详细解剖一番”，从“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的角度来强调思想启蒙的必要性。^②这样，相对于希腊人文主义传统的欧洲复兴，梁启超确认了本土文化传统在中国启蒙中的影响：经学启蒙是“以复古为解放”，而文学启蒙则是“傅益以己之遗产”。

梁启超对于中国启蒙的个人探讨，提供了具有开拓意义的个人研究范例，随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从钱穆不久之后在《国学概论》中，对“清代考证学”与“最近期之学术思想”进行介绍，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展开的同题考论，都可以直接见出。^③可以说，从梁启超到钱穆，开始建构出一个关于中国启蒙研究的本土学术范式。侯外庐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所讨论的范围，就是从“第十七世纪的启蒙思想”开始，到“第十九世纪中叶以至二十世纪初叶的文艺再复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7、96—99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③ 参见钱穆《弁言》、《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自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兴”结束。^①此后，由于出现了对“中国近三百年”进行古代、近代、现代的三分，侯外庐在1955年将《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下卷进行改写，“其中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的部分，经过补充修订”，改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后出版，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下卷中“十九世纪以后部分另改名‘中国近代思想史’，尚待改写”，^②最后在“选入他在四五十年代撰写的关于论述洪秀全和洪仁玕、严复、孙中山以及鲁迅思想的文章，作为本书附录”之后，以《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为名出版，^③尽管作者讨论并打算改写的是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王国维等人的思想。由于对这一研究范式进行了断代的改写，因而对于中国启蒙的研究，临近20世纪末，一些研究者仍然是在“中国早期启蒙”与“中国近代启蒙”的范围内进行。^④

对于经学启蒙转向文学启蒙的形态演变，从文学运动的角度进行确认的是胡适。1922年，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认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新旧文学过渡时代”，具体而言就是从“古文范围以内的革新运动”到以白话文学为根基的“文学革命运动”。这就在于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经学启蒙赖以进行的“古文学”已经成为“死文学”，即使经过改革，

① 侯外庐：《自序》、《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卷，重庆三友书店1944年版。

② 侯外庐：《自序》、《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③ 黄宣民：《后记》，侯外庐、黄宣民校订：《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④ 为了适应断代的要求，有的研究者将“中国早期启蒙”的起点与终点均提前，从“16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如萧蓬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有的研究者更是将“中国近代启蒙”从1840年延伸到1949年，其中资料选编如：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而学术论著如：彭平一：《冲破思想的牢笼——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也不过是“半死文学”，使经学启蒙难以通过古文继续进行。尤其是1905年以后“科举废止了”，尽管“有意地主张白话”以进行思想启蒙，但是，“有意地主张白话文学”是“一九一六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于是，由两千年来的白话文学发展而来的“国语的文学”，既是当下的“活文学”，更是过渡中的新文学，堪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各国的国语文学，在凸显“‘思想革新’的重要”的同时，更促进文学革命运动的“自由发展”，进而促成了“死文字”的古文为“活文字”的白话文所替换的“白话化”，从而推动了文学启蒙的全面兴起。^①这样，从文学语言到民族共同语的国语，在国语文学的中国生成之中，不仅显现出白话与白话文学的传统影响，而且更成为从经学启蒙转向文学启蒙的形态演变标志。

在确认文学启蒙中本土文化的传统影响存在的前提下，主张以国语的文学来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因而文学革命运动对于胡适来说，“我个人愿意将它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具有共识。^②这一“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个人认识，首先引发了对于胡适的“思想，以及他为探求中国对现代世界的思想反应所作出的贡献”的研究，而重点则放在对于“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的探讨之上。^③其后引出了对“白话文理论、白话文学运动以及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内在关系”进行“重新审视”，以探讨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

①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说文学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0、81、99、126、143、146、153页。

② 同上；参见梁启超《自序》、《第二自序》、《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③ [美] 格里德：《序言》，《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鲁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发生过程”。^① 这就表明，中国启蒙的形态演变，即使是“反映”了外来文化的现代影响，本土文化的传统影响也更是“内在”的。

这样，文学启蒙一旦兴起，所谓的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的关系，就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彼此承接的，呈现出“新旧文学过渡”之后新文学的自由发展，由此方出现对于新文学的源流进行探讨的可能性。

对此，周作人在1932年就指出：“文学与政治经济一样，是整个文化的一部分，是一层层累积起来的。我们必须拿它当作文化的一种研究”，这就要求对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进行整体性考察。所以，“中国文学的变迁”事实上表现出中国文化的变迁，出现了“以‘说出’为目的”的“言志派”文学，和“以文学为工具”的“载道派”文学，两者随着“统治的力量”的强弱而彼消此长，尤其是“文学方面的兴衰，总和政治情况的好坏相反背着”。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文学发展的个人认识模式：文学发展是基于文学本位，还是基于工具本位，这主要与政治对文学的控制相关，政治控制的力量弱，以“言志派”文学为主，文学就兴旺发达；而政治控制的力量强，以“载道派”文学为主，文学反而衰败不堪。于是，周作人从“这次的新文学运动”出发进行历史的追寻，发现了“明末的新文学运动”这一中国新文学的本土源头。认为“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许多作品也都很相似”，尽管“民国以来”的新文学运动还受到“西洋的影响”。^② 周作人通过对新文学运动的文学渊源进行的历史追溯，强调了新文学发展中本土文化的传统影响

① 高玉：《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②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13、17、19、18、28、23页。

的重要性，揭示了中国的文学变迁与思想启蒙之间的相对一致。

随后蔡元培更是将新文学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认为欧洲文艺复兴所“复兴的，为希腊罗马的文化”，而“我国周季文化，可与希腊罗马比拟”。这就将新文学运动的文化源头推向先秦。同时又指出，复兴不是复古，欧洲文艺复兴又是文化与文学的“一种革新的运动”。这样，“明清之间”已经出现了文艺复兴的中国动向，所谓“远之合于诸子的哲学，近之合于西方的哲学”；而清末“有维新派，以政治上及文化上之革新为号召”，其中已经能够“附以近代人文主义的新义”；民国建立以来，“自由思想的勃兴，仍不可遏抑”，“主张民治主义和科学精神”的新文化运动兴起，“由思想革命而进于文学革命”。这无疑表明中国启蒙的形态演变与外来文化的现代影响是分不开的。不过，蔡元培认为“以白话代文言”的文学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①虽然这仅仅是有关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一种个人认识，但是，这一个人认识中所显现出来的，正是“文以载道”的本土文化传统的负面影响。这就在昭示新文学运动中潜隐着文学工具化的现实性的同时，揭示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研究，也会受到同样影响的可能性。

对新文学运动所进行的历史研究，开始了以大学课程“中国新文学史”的设置为标志的学科建构，1950年这一学科建构受我国教育部的指导：“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②这样，新中国的第一部“中国新文学史”也就自然包容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显现出“中国新文学史”在新文学运动的继续延伸之中文学史的当

① 蔡元培：《总序》，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② 王瑶：《出版自序》，《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下开放性。此后，又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从“中国新文学史”中删去，“以保持它属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史的比较完整的体系”。^①于是，以新中国的成立进行文学史的封闭性断代，出现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分，中国新文学运动终结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当代文学的到来，而与现代文学合二为一：“由‘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人们一向习惯称为‘新文学’”。这是因为“只有从‘五四’开始的现代文学才可以说是与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同呼吸、共脉搏的，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②现代文学对于新文学的置换，证实了新文学发展的历史研究中所受到的、来自主流意识形态强化之下的文学工具论影响。

当然，现代文学与新文学一样，都同样可以作为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断代命名，不过，与当代文学相对举的理应是现代文学，因而在学科建构之中，现代文学最终还是取代了新文学。那么现代文学的起点又在何处呢？这就涉及现代文学的断代问题。

在中国文学史中较早进行近代与现代之分的，是钱基博在1936年写成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不过，他认为不能以朝代鼎革来为文学断代，而应该根据文学发展的变与不变的特征进行断代，因而文学史的断代既不同于政治史，也不同于学术史，他进而对中国文学史进行“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的四分，从明初到清末的中国文学即为“近代文学”，而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文学即“现代文学”，尽管“详于民国以来而略推迹往古者”，也不能称为民国文学，因为“所推文学家者，皆早崭露头角于让清之末年”，注意到文学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与此

① 王瑶：《重版后记》，《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② 王瑶：《“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重版代序》，《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同时，“现代文学者，近代文学之所醅酵也。近代文学者，又历古文学之所积渐也。明历古文学，始可与语近代；知近代文学，乃可与语现代”。这就强调了本土文学对于文学发展的传统影响，因而现代文学中“古文学”与“新文学”并存，区分两者的标准就是：“词融今古，理通欧亚，集旧文学之大成而要其归，蜕新文学之化机而开其先”。^① 这样，《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的“新文学”，就同时包容进古文革新与文学革命的文学成果，而不仅仅是白话的新文学，因为这两者都具有“理通欧亚”的思想启蒙特征。这就提供了一条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个人理路来，并且开始得到当下的回应。^②

随着以政治革命性质的更替来进行断代，出现了以旧民主主义革命为终点的近代文学，而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起点的现代文学，其分界点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的命名置换，虽然也进行过现代文学起点的调整，不过是从1919年微调到文学革命倡导的1917年，因为文学革命为五四运动进行了思想准备。以政治革命性质的更替来进行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三分，即便是展示出紧随政治革命的时期转换而进行文学发展的及时变动，至少失落了文学发展的内在一致性。因此，如何突破“三代”文学的革命性静态封闭，而展现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文学性动态开放，也就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于是，就有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要求将文学发展置于中国社会现代化之中来进行讨论，以显示文学发展的完整性。不仅要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视为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发展过程，而且更指出在1898年，“与古代文学全面的深刻的‘断裂’开始

①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9、38、11页。

② 参见朱德发、贾振勇《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0页。

了”，因而 1898 年也就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①这不仅促成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学科性开放，突破了当代文学的断代封闭，^②更是将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前移到 19 世纪的清末，突破了近代文学的断代封闭。^③更为重要的是，“二十世纪文学”并非单单是一个年代性的断代文学史概念，而主要是一个时代性的现代文学观念，实际上已经促成现代文学既能与古代文学相对举，更能与传统文学相对举，从而使现代文学这一断代开始得到学科建构中的广泛认可。^④

通过对以上三个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到的就是，从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对于中国启蒙与现代文学之关系所进行的不同层面与角度的研究，已经揭示了文学启蒙与现代文学思潮之间的一致性，尤其是强调了本土文化与文学的传统影响，无论对于文学启蒙来说，还是对于现代文学思潮来说，都是不容忽视的，尽管这一影响在现代文学发展中已经表现出正负两面性。这就为展开有关文学启蒙与现代文学思潮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有助于对文学启蒙与现代文学思潮生成这一论题的提出与探讨。

从现有关于文学启蒙与现代文学思潮的研究来看，通常表现为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进行近代与现代之分的断代研究，第

① 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 年第 5 期。

② 参见朱栋林、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③ 参见樊骏《〈丛刊〉：又一个十年（1989—1999）》，《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 年第 2 期。

④ 参见 Kirk A. Denton, e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Writings on Literature (1893—1945)*,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Bonnie S. McDougall and Kam Louie,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Hurst & Co. (Publishers) Ltd., 1997.

二个特点是将本土传统文化与外来现代文化割裂开来进行单一研究；第一个特点引发了第二个特点，而第二个特点正好强化了第一个特点，从而导致断代的单一研究成为颇具影响的研究范式。

这样，对于文学启蒙的研究，主要是视为在外来文化影响之下的思想启蒙，并且以新文化运动为界进行近代启蒙与现代启蒙的断代区分，直接影响到文学思潮研究的断代，对从“小说界革命”到“文学革命”以来的中国文学思潮进行近代与现代之分，^①以至于国外学界论及现代文学思潮也大多以文学革命为起点。^②这样，实际上将现代文学思潮的生成过程分割开来，更是将“人的文学”的思潮发生归属于文学革命的过程之中，因而也就直接影响到对于文学启蒙与现代文学思潮之间的多重关系未能从整体上进行把握，使现代文学思潮的生成过程难以整合，对文学启蒙与现代文学思潮之间在意识形态重建层面上的复杂联系缺乏较为全面的认识。

不过，就中国文学启蒙与现代文学思潮的研究趋势而言，同样也出现了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进行历史分期的长时段研究，第二个特点是进行现代转型的综合研究；第一个特点促成了第二个特点，而第二个特点推进了第一个特点，从而使得基于长时段的综合研究成为影响越来越大的一种研究方法。

这样，对于文学启蒙的研究，首先是突破了所谓的近代与现

① 参见叶易《近代文学思潮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张大明等：《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许志英、邹恬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参见 Bonnie S. McDougall,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to Modern China 1919—1925*, Tokyo: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1971; Marian Galik, *The Genesi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1917—1930)*, London: Curzon Press Ltd., 1980。

代之分，将其置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之中来加以探讨。^① 其次是注意到中国启蒙传统的现实存在，开始进行从经学启蒙到文学启蒙之间的本土文化影响的相关研究。^② 与此同时，对现代文学思潮的研究也突破了所谓近代与现代之间的断代鸿沟，进而引发了对文学思潮的长时段研究，对现代文学思潮生成过程中本土文学传统的存在也予以重视。^③ 由此，在拓展研究视野的过程中，对中国文学启蒙与现代文学思潮生成才有可能展开较为深入的讨论，以期能够把握两者之间的多重联系。

① 参见周积明《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参见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参见陈伯海主编《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张光芒：《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目 录

序 中国启蒙与现代文学	(1)
导言 经学与文学	(1)
一 经学的从兴至衰	(1)
二 文学的由杂转纯	(15)
第一章 中国文学启蒙的缘起	(30)
一 中国启蒙的文化性质	(30)
二 从经学启蒙到文学启蒙	(39)
三 启蒙即救亡的文化传统	(49)
第二章 现代文学思潮的肇起	(60)
一 中国现代化与文学启蒙	(60)
二 文学启蒙与文学思潮	(69)
三 文学思潮的现代启蒙	(78)
第三章 中国文学的整体革命	(89)
一 清末文学各界革命的发端	(89)
二 从小说界革命到文学革命	(103)
三 中国文学的语言革命	(115)

第四章 文学启蒙的个人先觉	(126)
一 教育体制的现代转化	(126)
二 留学生的文化传播	(140)
三 先觉者的文学反思	(152)
第五章 思潮主流的“人的文学”	(165)
一 从“民本”到“人本”	(165)
二 鼓吹“新民”的文学	(176)
三 倡导“人的文学”	(187)
第六章 现代文学的中国轨迹	(199)
一 文学转型的思想启蒙	(199)
二 文学变迁的革命起点	(212)
三 文学运动的世纪发展	(224)
余论 徘徊于朝代和时代之间	(243)
参考书目	(254)